

刊》亦未收入此书，却收入了据此书翻刻的刘龙田本《西厢记》。直至最近，蒋星煜在《明刊本西厢记研究》一书及有关的论文中，才对徐士范本做了全面的评介，并说明此书是“在上海图书馆发现”的“孤本”（上书第41页与第279页）。蒋先生发现徐士范本《西厢记》并澄清了它与同称为《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》的熊龙峰本，刘龙田本的先后嬗变关系，功不可没。但此书并非“孤本”，亦非上海图书馆所仅藏，北京图书馆善本部亦藏有此书，而且保存得极为完好。唯惜《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》未予著录，馆藏善本书目目录卡片也仅仅标明：

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二卷

元王德信关汉卿撰

北西厢释义大全一卷字音大全一卷

附刻园林午梦一卷

明万历刻本

四册

并未注明为徐士范本及具体刻书年分，不象另一同名刻本即刘龙田本著录为“明余泸东校正”“明书林乔山堂刘龙田刻本”那样明确（这显然与原书的题署有关），遂致使北京图书馆所藏的徐士范本《西厢记》不为人所知。为了使这一珍贵的《西厢记》善本发挥其应有的作用，兹赘述如上，并乞专家指正。

“径山藏”正续藏的刊刻时间及其它

孔 毅

“径山藏”是刻于明末清初的一部佛藏。《中国版刻图录·

《石门文字禅》条写道：“全藏由冯梦禎、陆光祖倡议募刻，始事于五台，继在径山寂照庵、兴圣万寿禅寺及嘉兴、吴江、金坛等地刻板。自明万历七年至清康熙十六年正藏告成，其后又刻续藏、又续藏。明末遗民逃为僧者，其著作多刻入又续藏。六百七十八函，六千九百五十六卷，函编号始天终鱼，续藏十九函，又续藏四十函，均未编号。每书卷后有刻书年月、施刻人，及刻工姓名。北京佛教协会、北京图书馆藏有全藏，缺卷不多。”基本上说清了径山藏的刊刻始末，但有几点是值得讨论的。

其一，图录说全藏由冯梦禎、陆光祖倡议募刻。检紫柏老人集卷十三《刻藏缘起》一文，备述藏经募刻酝酿过程，却并非如此。原来真可（即紫柏）在万历初曾听法本谈到袁了凡慨叹请经困难，有易梵夹为方册的愿望，而法本自虑力弱难行，因此真可为撰刻藏缘起，陈说刻藏利益，呼吁募刻全藏。同卷《刻大藏经疏》也说：“用是吾道开、法本、不揆下愚，远追德意，誓刻经律论之全藏，愿报佛法僧之至恩，力微而满愿为艰事，胜而资檀须普或十函五函，量缘而襄刻，或一部二部，随意而乐成。”德清所作《达观大师塔铭》讲得更明白，真可“念大藏卷帙重多，致遐方僻陋有终不闻法名字者，欲刻方册，易为流通，普使见闻作金刚种子，即有谤者，罪当自代，遂倡缘。时与太宰光祖陆公，司成梦禎冯公，廷尉同亨曾公、同卿汝卿瞿公等议，各欢然愿赞佐，命弟子密藏开公董其事”。清凉山志卷三《密藏幻余传》、《紫柏大师传》同。可见首先提倡募刻的是真可和尚，冯、陆二人只是积极赞助人而已。冯、陆在当时官场很有地位，但在佛教界不过是真可的弟子，钱谦益《初学集》卷五十一有冯氏墓志铭，说他“紫柏可公以宗乘唱于东南，奉手把衣称幅巾弟子。”哪里有倡议这样大的佛藏刊刻工程的威望呢？冯氏曾写过一篇《议复化城缘引》，可那又是在刻板中心由五台山转至嘉兴后，冯氏企图恢复化城作为贮经板所，后来由于当地长官吴用先的参预，得遂所

愿，但这与倡议募刻全藏是有区别的。

其二，图录说：“自明万历七年至康熙十六年正藏告成，其后又刻续藏，又续藏。”但据文献记载，正藏开刻在万历十七年，德清《达观大师塔铭》、《清凉山志》卷三《密藏幻余传》、《紫柏大师传》都是如此。《紫柏老人集》《刻藏缘起》还提到万历七年从嵩山到五台，说服法本的事，接着有“然犹未举行也”。后又接写道开问法时说服他刻藏的事，可见正藏的刊刻不可能始于万历七年。

续藏的始刊亦在万历年间，如万历十八年瞿汝稷、缪希雍捐资刻的《略释新华严经修订次第决疑论》在续藏十八函，万历四十七年钱谦益捐刻的《道余录》在续藏四十二函即是。所谓正续藏并非以刊刻时间为界，而是以明官刻的南北藏是否收录为区分的，正藏一律沿用南北藏的千字文编排，所以北京刻经处的《嘉兴藏目录》卷首可以写“遵依北藏字号编次画一”，二百六函前可以写“北藏缺，南藏号附”，可证明正藏各经都是有本可依，有号可复的。当时很多南北藏未收的佛经以及明代释氏的著作，为了得到流通，也依藏经板式刊刻，将板送到化城寺，后来统一分函，这就是续藏的来历。如当时钱谦益曾撰《心经略疏小钞》二卷，《牧斋尺牍》有致毛晋函说：“《心经》既欲流通，似须照藏板为妙。”（但径山藏中未见，不知何故。）续藏经十六、十七函《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忏仪》也是毛晋所刊，书后有校订、捐资者木增的跋，“大方广佛华严经三昧忏仪一部共四十二卷六十一册，直达南直隶苏州府常熟县隐湖南村笃素居士毛凤苞汲古阁中，鸠良工雕造，起于崇祯庚辰孟夏，终于辛巳暮春，凡一载功成，今置此版于浙江嘉兴府楞严寺藏经阁，祈流通诸四众。”这些都可以证明续藏经的刊刻是没有统一计划的，只是后来统一编函而已，刊刻时间也多在康熙以前。

其三，所谓六百七十八函。这是千字文从“天”到“鱼”的数

字，南、北藏也许是按此数分函的，径山藏由于改成方册线装本，每函可收三至四号，因此实际正藏只有二百十函，无论是故宫图书馆的藏本，还是北京刻经处翻刻的顺治时《嘉兴藏目录》，都是这样，其余原装藏本大约也不会例外。

其四，所谓每书卷后有刻书年月、施刻人及刻工姓名。应该说明这只是正藏的情况，续藏虽然多仿正藏板式，但体例仍颇驳杂。如上述《华严经海印忏仪》，续五十五函的《憨山老人年谱自叙实录》、七十三函《牧云和尚语录》等都没有刻工姓名。

另外，图录说续藏十九函，当为九十函，可能是笔误，也附订正于此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系

清代处理明赋役档案黄册的情况

赵 践

明王朝朱元璋取得全国政权以后，为了强化封建统治，于洪武十四年（公元1381年）开始在全国建立黄册档案。这种档案以户为主，“令人户自将本户人丁事产，依式开写”，《大明会典》卷二十，又以十户为甲，一百一十户为里，成为一册。册成，一式四本，一本送户部，另三本则布政司、府、县各留其一。明王朝在南京后湖（即玄武湖）建库房九间，存黄册53,393本，万历三十年（公元1603年）又建库房667间，存黄册150多万本（见《后湖志》）。到明王朝覆亡前夕，已有黄册170万本^①以上。

这批黄册，在清代档案——顺治十八年（公元1661年）的户科史书中，有如下一段记载：

查江宁后湖存贮明季黄册，先任督饷侍郎廉童、马鸣佩咨